

時報書系 327

金瓶梅的 問世與演變

魏子雲著

金瓶梅的
問世與演變

魏子雲／著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時報書系 327

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

著者 魏子雲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印刷 沈氏藝術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二一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二十日

二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十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

定價新臺幣一八〇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翁 序

翁同文

關於金瓶梅這部小說的來歷問題，以往吳晗等人雖有一些比較合理的看法，魏子雲先生並不滿意，於九年前就已開始研究。去年春夏間，魏先生將歷年發表的論文彙編爲「金瓶梅探原」一書出版，旋蒙惠贈一冊，因得細讀。按魏先生書中創意頗多，雖有幾項只是富於啓示性的假設，但對兩個重要問題則已獲得確鑿證據而有定論，允稱新的貢獻。今年春間，蒙魏先生續示新撰兩篇論文稿本，知他又從最早刻本「金瓶梅詞話」的特徵中發現若干「隱義」，足以論證前此在「探原」中所提出的幾項假設，遂使金瓶梅一書的出現背景以及最早兩個刻本相異的種種現象，都有連貫會通的合理解釋，尤其是重要創獲。如今魏先生已據新的發現另寫此書綜論，我既得先讀稿本，很高興就個人所見，將吳晗以來到魏先生的研究作一個簡要報告，藉資介紹。

關於金瓶梅的作者，明末以來雖多不同傳說，向以嘉靖間王世貞爲報父仇而作一說最爲

流行，但在民國廿一年以前的學者，從未見崇禎以前刊本。廿一年冬北平圖書館購入一部「金瓶梅詞話」，有欣欣子序說作者是蘭陵笑笑生，又有萬曆四十五年季冬東吳弄珠客序，都不見於流行本。吳晗於廿二年撰文考證，除證明作者絕非王世貞以外，並據書中有萬曆年間史實一點，判斷成書年代約在萬曆十年到三十年間。由於沈德符說過在萬曆三十七年稍後即有刻本，吳氏並認為新發現的「詞話」本並非最早刻本。至於有關作者其他異說，例如有人曾據書中多山東話遂以作者是山東人，自從「詞話」本發現得知作者自署蘭陵以後，有人又以爲當即荀卿曾經作令的山東蘭陵，吳晗則未加討論。

如「探原」一書各文所示，魏先生的論點雖多，但依鄙見，要以作者是曾經久住北方的江南人以及「詞話」本前並無更早刻本兩項，最具確鑿證據，使人難有爭辯餘地。關於作者籍貫問題，魏先生首先廣泛舉證，論斷所謂書中山東話實爲北方各省通行語言，並點明東晉以後江南也有蘭陵，藉以否定作者必是山東人之說。然後又從書中也有不少吳語，且飲食起居方式以及器具物產多是江南習俗等等，從而論斷自稱蘭陵笑笑生的作者，當是曾經久住北方的江南人，論據亦頗充分；事後得知姚靈犀對作者是山東人之說也曾疑致，則是不謀而合，有助定案。關於何時出現最早刻本問題，前人都以沈德符說過的話作準，即沈曾記萬曆三十八年馬仲良權吳關時，馬曾勸沈將其手中抄本付書商刻印，沈雖未應，不久吳中即有刻本云云。沈德符這種說法，魏先生考明兩項事實加以否定。一是馬仲良權吳關一事在萬曆四十一年，二是萬曆四十三年李日華從沈處所見的金瓶梅也仍是抄本。按李日華與沈德符都是

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地近吳中，如果該時以前吳中早有金瓶梅刻本，且不說李日華不會不知，沈德符也絕不會只以抄本見示。由此可見直到萬曆四十三年金瓶梅仍然未有刻本。由於「詞話」本金瓶梅有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序，上距李日華見抄本時不到三年，又可推知這三年間也無另一刻本可能。以這種種作爲前提，魏先生論斷「詞話」本就是最早刻本，前此並無更早刻本，自然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除上述兩項可以徵信的結論以外，魏先生也曾隱約看到一些跡象，據以提出若干假設，比較重要的有下列三項。一是自從萬曆二十四年以來只藉抄本流傳的金瓶梅可能不是今人所見的穢本。二是「詞話」本可能是從前此非穢本的金瓶梅改寫而來。（以上見「探原」頁四七）三是有萬曆丁巳敍的「詞話」本也許要到天啓年間才出版行世。（見「探原」頁二二〇）從時間上看，這三項假設已經涵蓋自金瓶梅成書到最早刻本出現之間的重要時期，自必牽涉好多相關問題，如果都能論證，意義重大可知。

今年夏初魏先生所撰二文，一是「金瓶梅頭上的王冠」，一是「金瓶梅編年說」，主要乃從「詞話」本與崇禎本相異的特徵發現其中政治諷喻，除可藉以論證前述三項假設以外，兼可解釋崇禎本與「詞話」本相異原委，遂使前後有關問題，都可會通解決。由於政治諷喻暨推論所得各點實爲本書主要創獲，故不妨於此撮述其中論據，以見概略。

按一般讀者固知金瓶梅是市井土劣西門慶故事，且多淫穢部分，但除學者以外，殊少人知「詞話」本第一回先述項羽與劉邦故事，卽楚霸王寵虞姬終死戰場，漢高祖寵戚姬欲廢嫡立庶亦使戚姬日後死於呂后之手，在崇禎本第一回已經被刪去逕行改寫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且影響其後多回也有改寫之處，兩本原有相異情形。以往學者雖知這種情形，但究竟緣故何在，則未有人論及。魏先生發覺其中必有重要問題，遂加研究，首先指出下列現象，即第一回已經改寫的崇禎本，自始至終都是西門慶故事，情節尚稱一貫，但「詞話」本第一回的劉項故事與後文的西門慶故事，在情節上完全無涉，就劉項是帝王而西門慶是平民看，頗似平民頭上出現「王冠」，未免不倫不類。由於明清章回小說多有楔子以啓後文，亦即楔子中的故事與後文情節大都相類或相涉，前後必有呼應，魏先生又得啓發，從而判斷「詞話」本第一回的劉項故事原來當是楔子性質，後文原來當也有涉及帝王的故事情節與之呼應，只因有涉帝王的情節已經改寫，故此顯得淫穢部分特多，遂與第一回劉項故事無涉。由於明神宗朱翊鈞寵鄭貴妃要想廢長立幼，引起朝臣諫諍，政潮迭起，曾有隱名之書諷喻，概視作「妖書」嚴禁，魏先生並據前後有關金瓶梅一書的事實與當時政治情勢結合，推論下列三點。

第一，金瓶梅一書自從萬曆二十四年以來即有半部由文人輾轉傳抄，內容若只以淫穢故事爲主如「詞話」本，從當時社會的淫佚風氣，當早有人續成全書刻印營利，不致只在文人之間藉抄本流傳，遲遲未見刻本。由此可以推知「詞話」本前的金瓶梅，可能是一部政治諷喻頗爲明顯的小說，即第一回以劉項故事作楔子如「詞話」本，藉漢高祖寵戚姬欲廢謫立庶影射當時在位的神宗皇帝外，後文必尙有相似或有關的情節與楔子呼應，只因諷喻性過於明顯，恐觸「妖書」禁忌，無人敢於刻印流行，亦即金瓶梅原稿本。從前述種種有關事項，這一推論自可成立，但抄本既早不存在，其第一回後與帝王有涉的故事情節實不易猜測。惟魏

先生指出「詞話」本第一回於劉項故事之前揭明「情色」兩字，崇禎本第一回始於西門慶故事，其前只揭「財色」兩字，則原稿本金瓶梅後文可能以「情色」為主，較少淫穢部分。

第二，原稿本金瓶梅因政治性諷喻頗為明顯，無人敢於刻印，遂有人據以改寫後文，即刪去與帝王有涉的故事情節而增加淫穢部分，使第一回仍然保留的劉項故事，因失去後文可資對照啓發的有關情節而沖淡諷喻性，藉望無礙刻印，就是「詞話」本的由來。按見於記載的早期金瓶梅，傳抄者都說只有半部，但到萬曆四十三年，李日華從沈德符處見到的已是全部，李並斥為「市諱之極穢者」，可見內容與兩年後四十五年丁巳序的「詞話」本無異。由此可以推知，從原稿本改寫而來的「詞話」本，當萬曆四十三年以前某時，就已完成。惟魏先生又從書中另一特徵論證有了巳序的「詞話」本並未立即刻印，經過四年到天啓元年冬季以後，又經一次改寫才行刻印，容待後文再述。

第三，從原稿本金瓶梅改寫而來的「詞話」本，後文雖已刪除去有涉帝王的故事情節，但既保留第一回的劉項故事，則仍有諷喻痕跡。大概後來有人覺得這點也是不妥，遂將劉項故事刪去再行改寫，即開卷就寫西門慶熱結十兄弟，影響到第二回以下多回也須零星改寫，使原有的政治諷喻不留絲毫痕跡，到崇禎年間另行刻印，就是崇禎本。

按「詞話」本與崇禎本第一回相異，前人未明緣故，魏先生結合前後有關事實推證先有政治諷喻頗顯的原稿本，遂使前後改寫原委粲如列眉，沿革同異都有合理的解釋，自非虛妄。就劉項故事有諷喻性原為「詞話」本改寫人所知，竟然仍予保留，致使後人發覺再行刪

去一點，可知非出偶然，必因特意欲使諷喻性仍留痕跡之故。就諷喻對象爲神宗皇帝且當時仍然在位，易使敏感的人聯想發現一點，又知這一痕跡也可使刻印之人有所顧忌。然則有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冬序的「詞話」本，也有遲遲未敢刻印的可能。知道這種情形，就可繼述魏先生對於「詞話」本的另一發現，但仍應從神宗皇帝之死說起。

神宗皇帝在位很久，直到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下旬死後，才使屢欲廢而未果的太子常洛得以繼位。常洛於八月初一登基，詔頒明年改元泰昌，但到九月初一，在位只滿一月，就已因病服「紅丸」而死，又使兒子由校繼位。廟號光宗的常洛在位既僅一月，所頒明年改元泰昌一舉未成事實，於是發生應否爲他保持泰昌這一年號的問題。當時朝臣對此曾有以下三種主張。一、上借父下借子，改萬曆四十八年爲泰昌元年，使泰昌佔有圓滿的一年。二、常洛在位既僅一月，談不上年號，這一年應仍爲萬曆四十八年，改明年爲天啓元年。三、七月以前稱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明年是天啓元年。最後終於採用第三種主張頒詔天下，使泰昌年號占有萬曆四十八年的後四個月，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按「詞話」本所保留的劉項故事原以欲廢太子的神宗皇帝爲諷喻對象，也有因神宗仍然在位而遲遲未敢刻印的可能，已見前文。但到太子因神宗之死而得繼位，既又發生上述從未有過的年號問題，如有人問當時着手付刻的人會否於書中再動手術加以影射，然後始行付刻，固嫌神經過敏，可是魏先生確又從第七十七第七十二兩回中發現這種跡象。關於這點，又須從金瓶梅故事的由來說起。

按水滸傳第二十六回（金聖嘆批本第二十五回）本有武松鬪殺西門慶故事，所以金瓶梅的故事，實乃作者將水滸該回改寫爲武松誤傷他人，使西門慶潘金蓮仍得逍遙法外若干年，作爲小說主角，到第八十七回再寫武松自梁山回來殺潘金蓮等等情節而成。由於這一緣故，凡見於水滸的北宋徽宗年號如政和、重和、宣和等，也都見於金瓶梅。金瓶梅中這些徽宗年號既與故事俱來，原很自然，當代學者如吳晗等發現書中包含萬曆年間的朝野事實，也只認爲借宋影明，雖有寓意，仍是泛泛。但日本學者鳥居久靖，則根據書中所述干支日子推算出第七十回所寫的冬至日是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上，與萬曆三十七年的冬至相合。可是魏先生有見於徽宗在政和七年改元重和，僅一年又改元宣和的事實，却發覺泰昌與重和頗爲相似，可以牽合之應。由於「詞話」本第七十一回將政和七年的改元重和寫成「詔改明年爲宣和元年」，到第七十六回曆日頒下，才又寫「改了重和元年」，顯有次序顛倒現象，又指出不是因爲作者不知徽宗年號先後，而是有意錯綜處理，藉以影射常洛死後的改元意見。卽第七十一回的「詔改明年爲宣和元年」實乃隱指天啓元年，藉以隱喻改元的第二個意見，否定泰昌的存在，而第七十六回的「改了重和元年」實乃隱指後來終於採納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藉以隱喻改元的第三個意見。在年號的寫法以外，魏先生又將第七十第七十一兩回所寫的兩個冬至日作精密推算，確定一在十一月廿八日，一在十一月初九，與泰昌元年與天啓元年兩個冬至日全都符合，作爲更難否定的證據。又崇禎本既從「詞話」本改寫而來，魏先生並從崇禎本對這兩項不同寫法又曾改寫作爲外證。一是崇禎本已將「詞話」本中

重和與宣和次序顛倒的現象改正，二是「詞話」本中對於影射天啓冬至日的有關日子，可據以算出十一月初九，而崇禎本已將那些可據以推算的有關日子改寫，使人只能推出其他日子，無從與天啓元年的冬至日關合。由於這種情形，可知改寫崇禎本的人和改寫「詞話」本的人態度不同，爲使政治諷喻不留絲毫痕跡，連這一點隱微的影射也要去掉。按「詞話」本對年號與兩個冬至日的寫法各有影射云云，如只分別單獨地看，未免孤證，或可諉爲乃出附會，但將兩者結合而觀，則頓趨明顯，就後來崇禎本又將有關文字改寫使之不留痕跡，尤其鐵證如山，難以否認。據此以斷「詞話」本刻於天啓元年以後，與日本版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從版式判斷，當刻於天啓年間符合，自是不爭之論。按法國學者雷威安(ANDRE LEVY)先生曾經讀到魏先生的「編年」一文，於其今年所寫的 *Recent Chinese Publication on Chin Ping Mei* 文中並加介紹。雖然認爲魏先生對於重和與冬至日寫法的解釋很有創意，但仍以爲可能由於疏忽所致，非必有意影射。竊意如果能續讀「王冠」一文或本書，見解必將不同。便此附及，以待後驗。

按吳晗於考明金瓶梅到萬曆中葉始行成書以後，曾論該書內容多反映萬曆時期的社會現象，是富於寫實性的小說。魏先生繼吳晗等人研究，先行考明作者是江南人且有丁巳序的「詞話」本就是最早刻本，已見「探原」一書各文。去年以來又以劉項故事撰文論定「詞話」本前曾有政治諷喻頗爲明顯的原稿本，由是改寫而來的「詞話」本也延到天啓元年以後再行改寫始行付刻，後來又經一次改寫才成爲絲毫不見諷喻性的崇禎本，以見該書出現於萬曆中葉

以及其後到崇禎間約三十年的演變都有政治因素，並著本書細論。關於當代學者對於金瓶梅來歷問題的研究，我往年只讀過吳哈的論文。自讀魏先生的論著，藉知各家之說以後，認為吳哈以後至今，實以魏先生孤軍挺進，不斷超越前人，屢有創獲，成績最為輝煌。至於前後各項發現，如依鄙見，尤以悟得「劉項故事」意義一點，除學力外尚須識力，並非輕易可以達到，最為重要。

至於金瓶梅的作者，「詞話」本欣欣子序說是蘭陵笑笑生，欣欣子與笑笑生自然都是化名。魏先生於「探原」中曾據一些蛛絲馬跡懷疑沈德符或與改寫有關，刻印人或是吳中出版商袁無涯。魏先生既已論定作者是江南人，江南也有古名蘭陵之地，就丁巳年作序的是東吳弄珠客看來，似乎難脫關係。聞魏先生有意寫一「沈德符評傳」，甚以早讀為快，拭目以待。

民國六十九年八月五日于臺北東吳大學

蘇 序

蘇同炳

魏子雲先生新著「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即將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魏先生索序於我，忝爲魏先生大著的忠實讀者，義不可却。因草此文，以爲介紹。

三年以前，魏先生出版他第一本研究金瓶梅的專著——「金瓶梅探原」，其時因魏先生之厚愛，我也曾寫過一篇序文，坦白說明我對魏先生研究工作之能獲得如此豐碩的收穫，表示欽羨之情。當時我很知道，魏先生爲「金瓶梅探原」一書所花的研究時間，前後曆時七年之久。如今他以三年不到的時間，再寫成此書，不但時間上縮短甚多。其研究所得的成績也遠勝前書。足見魏先生這幾年以來，對金瓶梅的研究更加深入而獨到，所以纔能在既有的成績上迅速得到新的突破，超越自己，也超越前人，可喜之至。

三年以前，看魏先生在「金瓶梅探原」裏引用袁中郎寫給董其昌的信，說：「金瓶梅從何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枚生七發多矣！」當時的感覺，是此話不可理解。因爲

我們都知道，金瓶梅是一本出名的穢書，書中專寫閨房男女之事，十分露骨而大膽。西漢朝枚乘所寫的「七發」，乃是一篇以文采見長的辭賦，二者性質截然不同。以「雲霞滿紙」稱譽枚乘的七發則可，用之以比擬金瓶梅這樣的小說，似覺擬於不倫。以袁中郎的文才，應當不致說出如此不可理解的話，而魏先生對此亦別無解釋，此一疑問，只好藏之心中，一直無從解開。直到現在，再拜讀了魏先生寫在「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中的內容，方才豁然領悟。中心暢快，莫可言宣。

由魏先生寫在這本新著中的各項研究結論可以知道，明神宗萬曆末年所刊行的金瓶梅詞話，並非最初形式，世間曾因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有過多次的刪改。至於最初的金瓶梅，則是一本著重政治諷喻的小說，其內容專在譏刺明神宗之廢長立幼，與後來所見的形式截然不同。魏先生的此一見解，係由詞話本第一回所保留的劉項故事，後來在崇禎本的第一回中刪去另寫，由彼此比較所得到的啟發而來。此一不同之點，在他人也許認為不足為奇，魏先生却能以他的敏銳眼光看出其中的特別意義。並以明神宗中葉以後因立儲問題所引起的一連串政治事故為旁證，最後乃能認定，詞話本的最初原稿，實為諷喻明神宗之廢長立幼企圖而寫，其後乃因立嗣所引發的許多政治事件過分刺激皇帝，使得明神宗先後採取了許多十分強烈的壓制措施，此書亦因恐觸禁忌而遭不利，經過了一再的擱置與一再的改寫，最後方變成了後來的形式。只因刪削不盡，在詞話本與崇禎本二書的第一回中留下了刪削改寫的證據，終於乃為魏先生發現了刪改的事實。此一發現，不但可以充份解釋詞話本與崇禎本何以會有

不同的原因，連帶地也解決了許多與此相關連的問題；例如我在前面所感到困惑的那一點疑問，也因此而得以豁然貫通，實爲金瓶梅研究工作的一大創獲。翁同文先生十分推崇魏先生的此一創獲，以爲「金瓶梅探原」的發見雖多，究不若此一創獲的價值重大。相信讀者在讀畢此書之後，一定亦有同感。

「金瓶梅之問世與演變」，其最初之寫作方式亦與「金瓶梅探原」相似，乃是作者先就幾個專題分別研究，然後將這些散篇結集成書。這樣的寫作方式原本是爲了顧及發表的便利，事實有其必要。但如將這些分別成篇的論文結集成書，而仍舊保留其單篇的原貌，則因彼此間的敘述與介紹常有重複之處，不免影響全書之完整。因此我在魏先生寫完各個單篇以後，冒昧地向魏先生提出建議，以爲在結集成書之時，宜加酌量修改，以避免彼此間的重複，期使全書更有一氣呵成的氣勢。魏先生不以鄙說爲非，毅然捨棄原作，重新改寫全書，終於成爲現在的形式。以現在的形式與本來的散篇形式相比，當然更能顧及閱讀之趣味與體例之完整。魏先生這種追求至善至美的工作精神，至堪欽佩。因爲我深知魏先生的勞瘁辛苦，覺得有義務向讀者介紹出來，因此特別在此作一說明。

由「金瓶梅探原」以至魏先生此一新著之出版，可以看見，金瓶梅的研究工作，已因魏先生的辛勤努力而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對於魏先生的研究結論，也許會有學者專家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不論如何，魏先生的研究成績自有其一定的價值。任何學問，總得要有不斷的研究，纔能有不斷的創新，與不斷的進步。假如因魏先生的努力而能使金瓶梅的研究工作有

更大的創新與進步，魏先生的努力，就更有其意義了。不知讀者諸君，亦以鄙言爲不謬否？

六十九年九月三日寫於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

翁序

蘇序

弁言

上 編

壹 王世貞作金瓶梅的傳說

一、傳說王世貞作金瓶梅的相關原因

二、傳說王世貞作金瓶梅的各種故事

三、傳說王世貞作金瓶梅的最早傳說者

貳 金瓶梅非王世貞作

一、清明上河圖的沿革及其他

二、從「金瓶梅詞話」尋出的四條證見

參 金瓶梅非萬曆中期作品

一、王世貞能否作金瓶梅

二、「金瓶梅是萬曆中期作品」的商榷

肆 金瓶梅的傳抄、付梓與流行

一、傳抄

五 一 五 一 四 一 四 〇 三 九 三 〇 二 五 二 五 一 九 一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